

香港文藝叢書出版近況 以《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》為例

香港中文大學兼任講師 | 謝雋曄

「叢書」顧名思義是彙集多種著作的一套書，當中收錄的作品可成於一人手筆，也可以是數位著者的作品彙編，多有共同主題，反映編者對於某項課題的獨到觀察。在形式上，它可以不編次序；在出版上，它既可一次出齊多冊，也可逐冊陸續出版。簡單而言，叢書中每一部作品都是獨立存在的個體，但結集起來就是一部「大書」。

談起「叢書」，大家常錯覺它必定是圖書館內那些厚重無比的典籍，甚麼清代編的《四庫全書》、當代出版的《中國古典文學叢書》等，霸佔了幾排又幾排的書架，還認定自己一輩子也讀不完一整套書。然而，近年新出版的叢書，不一定像古時般浩瀚如海，也可以短小精悍，有其獨特意義。就像香港名作家也斯（梁秉鈞，1949-2013）生前所編的《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》，僅有6冊，卻是不可多得的佳作，讓讀者通過編者的選擇和介紹，初步接觸香港1950年代的文藝世界。本文以這套發行不久的叢書為例，淺談它的出版緣起和內容意義，借此反映香港近年這類書籍的出版情況。

* 《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》的出版緣起

《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》，由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編，為該中心「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」研究計劃的成果。2011年，這項計劃獲香港研究資助局撥款支持，讓也斯的研究團隊得以致力探討香港50年代的文藝活動，並於2012至2013年舉辦了多場講座及國際學術會議，邀得中、港、臺以至歐美、日本的學者參與，一同以跨文化、學科的視野，探討小城文化如何跟國際掛鉤。及後，該中心又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，加上百年老號中華書局應允支持，終有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編成叢書出版，以饗廣大讀者，一方面為學術研究者帶來啟示，另一方面燃起大眾對上世紀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興趣，期望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。

這套叢書合共6冊，首冊《也斯的五〇年代：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》最先於2013年5月面世。往後陸續出版的5冊，依先後次序為：《真實的謊言：易文的都市小故事》、《長夜以後的故事：力匡短篇小說選》、《半世紀掠影：馬博良小說集》、《五〇年代香港詩選》和《痛苦中有歡樂的時代：五〇年代香港文化》。

「叢書」本來就像一部「大書」，此書首尾兩冊正好活像整套書的「導論」和「結論」，而中間四冊自然便是各章「專論」。首冊通過也斯的介紹，旨於讓讀者看到上一代的香港文藝世界有多精彩，以吸引讀者追看這套叢書的一字一句；中間四冊則收錄一些能代表50年代卻早已教人忘懷的文學佳作，並附上編者的介紹，讓讀者親自感受到當時流行的短篇小說及詩篇其文字魔

力；而尾冊為了讓這套叢書圓滿作結，編者特別添上有關當世電影、音樂、藝術文化的評論，留待讀者閱畢這套叢書後，能走出書本的文字世界，繼而自行開啟視聽方面的藝術大門，找找老電影看，找找時代曲聽，好讓年青一代更深切體會 50 年代的香港風情，編者心思可謂細密。



·《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》前三冊於 2013 年 5 月面世。
(拍攝者及相片來源：香港藝術發展局、香港中華書局)



·《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》後三冊於 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陸續出版。
(拍攝者及相片來源：香港藝術發展局、香港中華書局)

在形式上，首尾兩冊為評論集，前者收錄也斯 10 篇有關 50 年代香港文學的論文，後者收錄各文化界別專家對當世文藝事業的論述，像有關電影文化的部分，有曾於香港電影資料館工作的蒲鋒、何思穎執筆；而音樂文化一節，有著名音樂家余少華、劉靖之及資深歌曲評論人黃志華撰文；至於美術方面，則有長期鑽研中西藝術的李世莊、羅淑敏提筆。中間四冊則為文學創作集，其中三冊分別選錄了南來文人易文（楊彥岐，1920-1978）、力匡（鄭健柏，1927-1991）和馬博良的短篇小說，另一冊則選錄了麥陽（楊際光，1925-2001）、徐訐（1908-1980）、崑南（岑崑南）等 36 位香港詩人的詩作。書中選錄作品，皆極具時代性，能充分反映當世文人心態、社會面貌和文學特色；而最重要是不少文字本已散佚，猶幸編者的努力，從一些近乎失傳的報刊中重新蒐集起來，實難能可貴，也反映這套叢書繼承中華傳統，對於保存一手文獻有重要貢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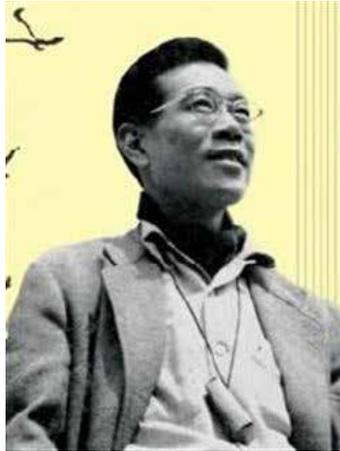
* 叢書所記南來文人眼中的香港

香港自開埠起，一直有不少新移民遷徙到此。1945 年後，國共對戰，不少內地文人為了避開戰火，選擇從大陸移居香港，繼抗戰時期後，再一次將北方文化帶來南方，讓這個本已長期受到華洋文化衝擊的小城，變得越來越複雜。自 50 年代開始，香港文化事業逐漸形成獨特的氣息，如要用一個詞語形容當時的文藝創作，那麼「雅俗兼容」四字相信最為貼切。正如也斯在書中開宗明義提到，本港流行而受大眾歡迎的報上專欄、連載小說，在語言風格上混雜文言、白話以至廣東俚語，在內容上則多描寫港人日常生活，或描寫小城社會面貌，洋溢濃厚的都市氣息，以便迎合本港讀者的口味，成為香港文學的一大特色。

讀者從第一冊書認知到都市文化跟香港文藝事業的微妙關係後，當他們正式翻開第二冊的書頁，頓時便可涉足 50 年代的世界。第二冊收錄香港名導演、填詞人易文於 50 年代初所撰寫的 37 篇短篇小說，由黃淑嫻所編。易文於 1937 年的盧溝橋事變後，即從上海遷居香港，自 50

年代起，曾編寫劇本六十多個，執導電影四十多部，填詞作品更過百首。活躍於演藝事業的易文，原來平日還喜歡從事文字創作，不僅在報上撰寫短篇小說，後來還結集成書。其小說集《真實的謊言》及《笑淚集》，前者於1951年由香港海濱書屋出版，而後者更由臺灣的出版社約於1952年前後發行，可見其作曾一度傳至寶島，在當時的影響力可謂不少。可惜六十年後的今天，不論香港還是臺灣讀者，都難以看到他的舊作，碰巧也斯這套叢書出版，正好讓我們有機會溫故知新，認識易文其人其作之餘，還能緬懷老香港風情。也許易文曾參與大量商業娛樂活動，因此他的短篇小說，不像其他南來文人如力匡、馬博良般喜歡「憶舊」，也不喜歡「發牢騷」、「拋書包」，只是運用簡潔通俗的文筆，細緻描寫重視物質的都市生活，當中不僅出現大量本港地方名，如銅鑼灣、九龍城、沙田等；還多描寫港人的地道生活，如很多男人喜歡到夜總會尋歡作樂，不少家庭主婦總是喜歡翻閱自己的銀行存摺等；有時還描繪到大眾因發白日夢而開心半天的心理，如年輕男生幻想自己有天成為有錢人，年輕女子則想像自己在不久將來覓得如意郎君等，自然較易獲得共鳴。即使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，易文小說所描寫的人性和都市生活題材，至今讀來仍然不會讓人覺得落伍，就像發生在昨天的故事一樣。比如〈真相〉一篇，易文將一位先生在街上踩蕉皮而擦傷手指的尋常事，通過主角本人、女友及男友的話，最後竟變成三個截然不同的版本——一個說自己是為了捉賊而弄傷，一個說主角因被拒愛而自殘受傷，一個說他被情敵狠狠打傷……作者以俏皮幽默的筆觸，調侃都市人總愛管閒事、喜歡大肆吹噓的一面，這種永恆不變的醜陋人性，實可超越時空、地域的限制，而這種新穎的多重敘事手法，罕見於傳統中國文學，滲透外國文學的味道，或跟易文學貫中西的背景有關。除了以輕鬆手法描寫人性陰暗面外，書中還有不少作品可反映50年代的港人生活，且笑中帶淚，正如〈夜總會的貴賓〉一篇，作者通過一位經理的回憶，以敘事者眼光娓娓道來一個真實故事——一對即將銀婚紀念的老夫婦，為了獲得夜總會的免費招待，不惜欺騙這位經理，聲稱有人要在星期二晚搗亂他的地方。為了防患未然，經理遂讓該對夫婦在周二晚前來享樂，以便他們找出打算破壞夜總會的人。最後，當然沒有壞人到此生事，卻終由老太太和盤托出內情——他們沒錢慶祝銀婚而心生此計，希望換來生平一個值得紀念的晚上。然而結局是經理不單止原諒他們，還願意超時營業，招待這對老夫婦繼續跳舞、喝酒，全因他受到眼前兩老動人的愛所感動。這個故事表面上看來不合情理，但反而讓讀者看到極力追求物質生活的都市人，原來背後依舊可以有真摯細膩的感情，讀後讓人會心一笑。誠如此冊編者黃淑嫻所言，易文的短篇小說，緊扣「都市」與「言情」兩個關鍵字，告訴我們此刻居住的地方縱然不是理想世界，甚至需要時刻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，但不論何時何地、不論身分高低，身為社會的一分子，始終會在作者的小說故事及現實世界中，找到自己的身影和立足地。

閱畢易文那容易消化而輕鬆有趣的短篇小說，讀者翻開第三冊書，即能體會另一種香港 50 年代風情。該冊收錄南來作家力匡 16 篇短篇小說，由也斯及鄭政恆所編。力匡於 1950 年從廣州移居香港，曾任中學教師，並主編文藝刊物《人人文學》及《海瀾》等。他最先以詩聞名，其作大談家國鄉情，終奠定「懷鄉詩人」形象，影響當世文壇。後來，他還開始創作小說，但其



· 易文（拍攝者及相片來源：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）

多愁善感的詩風，則沒有延續到小說上，反而換上含蓄而具諷刺味道的筆觸。據也斯的看法，南來文人由於對新環境不太熟悉，很容易便會把自己的懷鄉心情，轉化成對香港社會的敵視和否定。因此，在力匡筆下的香港，經常被描繪成一個崇尚物質主義的社會，人情也是建構於利益關係上。像〈焦大〉一篇，第一身敘事者「我」，突然接到一通電話，得悉某位老同學要辦一個同學會，希望跟多年不見的朋友敘舊，後來才知對方原來要借同學會的招牌來開賭場。「焦大」一名，來自《紅樓夢》中一個梗直敢言的小角色。力匡借這個名字，刻劃有位被人冠上「焦大」譚名的趙同學，不願意跟大家同流合汙，因此白白放棄了發財良機，最後甚至被人挖苦已到印尼婆羅洲生活。此外，書中其他選錄作品，如〈火災〉、〈陋室〉等，跟〈焦大〉一作同樣散發濃厚的黑色幽默色彩，前者講述一名前國民學校校長南來後要住破舊「木屋」的辛酸；後者則以西方戲劇式獨白，由身為地質學者的主角講述自己從武漢南來後要住「天台屋」的實況。力匡筆下的「焦大」、「校長」、「地質學者」，或許通通可以借代作者本人，又或是作為部分南來作家的寫照——他們在香港這個經濟至上的都市裡，不願迎合商業社會，不願參與投機活動，因此在生活中找不到昔日單憑文藝創作而能維生的滿足感。也許，放下身段實在是讀書人最難學懂的事，古今中外皆然。

至於第四冊叢書，收錄了馬博良 11 篇短篇小說，洋溢另一種 50 年代香港文化氣息。1949 年後，國共各據一方，不少支持國民政府的人，即使未能成功渡海至臺灣定居，也紛紛南下香港找安樂窩，而馬博良正好是其中一分子。要談書中讓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作品，非〈太陽下的街〉莫屬——每年的 10 月 10 日，為中華民國國慶，當時支持國民政府的本港居民，總喜歡在聚居地掛上大量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旗，以示紀念。故事時值 1956 年雙十，有政府職員無故將李鄭屋

徙置區所懸掛的中華民國國旗拿下，觸動當地居民情緒。他們先是包圍徙置區辦事處，後來因受三合會成員乘機煽動，終演變成大型騷亂，迫使政府派出防暴警察維持秩序，而雙方隨即上演激烈的街頭攻防戰，最後約六十人因此喪生，另有三百多人受傷，是為「香港雙十暴動」。馬氏〈太陽下的街〉一作，正好以涉事年青人為主角，描寫其參與騷亂時的心理變化——他先是義憤填膺，跟隨群眾四處破壞，還認為自己是正確而轟烈的；中段看到防暴警察出動，加上夥伴紛紛逃走，頓時變得膽怯；至結局時，因誤傷一位認得自己的警員而感到歉疚不已。這篇小說主要以第三人稱角度敘事，但中段部分加入主人翁大量內心獨白，嘗試從其眼睛細緻觀察當時情況，並展示其置身當中的心路歷程，滲透一點意識流的味道。相比起易文的刻意淺白、力匡的黑色幽默，馬博良的小說，看來較重視文學技巧，講究修辭及意境，試看〈太陽下的街〉有一段文字談到「太陽」和「月亮」道：



· 力匡（拍攝者及相片來源：香港中文大學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」）

太陽是要百物欣欣向榮的，是要眾生循正軌良好地發展的。只有那些拜月亮的，看不見太陽，才會製造階級鬥爭的幌子，屠殺那些阻止拜月或是信奉太陽的人；他們並不相信太陽，始終認為他們的月亮已夠光明，就是太陽，他們不理會生活在月亮底下是那麼冷酷，沒有溫暖和快樂，除了他們自己，別的東世不能滋長。（注1）

這番話顯然受到當世左右對立的政治氛圍所影響，也含蓄表達了作者本身的政見及立場。無可否認，「暴動」或許是負面的行為，可是這篇小說最大的意義，正是作者嘗試超越道德批評問題，反而認真思考涉事青年的心靈救贖——主角終在「狂妄瘋癲」過後，變回「冷靜和理性」，同時已「痛苦地領略這次教訓」，誠如結尾所言「他得救了」。另外，馬博良描寫香港社會風情的小說，當中的人物對話夾雜大量地道粵語方言（甚至包括粗言），像「爛仔（流氓）」、「唔得（不能）」、「丟那媽（去你媽）」等，乃突顯地方文學色彩的妙法，值得讀者留意。

閱畢三部短篇小說集後，叢書編者轉而向讀者介紹 50 年代的香港新詩。第五冊收錄 36 位詩人共一百零九首作品，篇幅或短或長，內容極為廣泛，正如該冊編者鄭政恆所言，當中主要題材包含「懷鄉與城市」、「左派與右派」等；至於形式上，有些繼承傳統的格律，有些則作現代的實驗，可謂各有千秋，能反映當世文學愈來愈多元化的特色，也意味香港文藝事業逐漸踏入百花齊放的新時代。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特別收錄原刊於 1951 年《香港時報》內的《香港浮雕圖錄》十六輯，此作乃當時文學與藝術跨界對話的產物，由麥陽作詩，名畫家唯陵（李國樑，1920-2009）繪圖，一首詩配一幅畫，聽覺、視覺交織，讓讀者見證香港早期的跨文化創作活動。隨著 50 年代「左右對立」的風潮下，書中詩篇在風格上有鮮明的對比色彩，像左派的何達（1915-1994）有〈簽名〉一作，表達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對 1958 年海軍船塢工人運動的支持，洋溢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，強調文學作品的實用性，也紀錄了香港昔日的歷史，具時代意義；至於右派的作品，大多強調抒情味道，滲透浪漫色彩，如夏侯無忌（孫述憲）、徐訐等人的詩，或

緬懷過去，或感時傷逝，往往能夠超越時空、地域的局限，讓讀者可以看到當世香港文學的多元性。



· 〈香港浮雕圖錄·跑馬地〉（拍攝者及相片來源：《五〇年代香港詩選》）

* 結語

近年，兩岸三地交流越來越密切，而香港及臺灣在現代文學上的深入交流，更早於 50 年代開始成熟——1956 年，馬博良在香港創辦《文藝新潮》，提倡重視個人象徵、新興美學的現代主義，這部雜誌獲臺灣學者秦賢次評為「第一本影響臺灣文壇的香港文藝刊物」。另據香港名作家劉以鬯的看法，50 年代臺灣重要文藝雜誌《筆匯》改版，正是受到《文藝新潮》的影響，足證兩地文學實「聲氣相通」。（注 2）或許，《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》中所描繪的老香港，當中某些風情，實跟 50 年代正同樣慢慢都市化的臺灣相若，實值得兩岸讀者玩味。

今天，市場對於傳統文史哲書籍的需求有減少趨勢，看書的人少了，而買書的人就更少。就此，各出版機構自然難以像昔日般，動輒招募大規模的研究團隊，耗時費力編纂各種大型人文叢書。然而，叢書在傳統圖書館學上，始終有極重要的地位，畢竟舊日一些零碎文獻，像一則在老報紙上刊登的短篇小說，又或是一篇出自不知名作家的新詩，要是它們未曾收錄於有系統的叢書當中，相信很快便會散佚，可見古今叢書不論大小，對於保存各類資料都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意義。正如本文介紹的《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》，就按照也斯等編者的見識和觀察，保存了不少早已讓人遺忘的 50 年代香港文學作品，讓現今讀者有機會重新看到一些珍貴而古老的記憶，重拾當年人情。誠然，這部叢書只得六冊，且限於短篇小說及新詩，偶爾又多收錄一些跟香港關係不大的作品，當然不能完全展示本港文學和文化的的所有魅力，但讀者先通過編者的介紹，再自行體味選錄作品，總算能將它看成是一把能打開昔日文藝大門的鑰匙，繼而進一步開拓其他領域。由此看來，小型叢書還是有其獨特的出版意義和閱讀價值，自然能夠吸引更多學人參與編纂工作。未來，像《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》的同類作品，相信只會在兩岸三地越來越多，以造福更多有興趣咀嚼文字、緬懷過去時光的讀者。

注釋

1. 馬博良，〈太陽下的街〉，載氏著，《半世紀掠影：馬博良小說集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13），頁 225。
2. 劉以鬯，〈香港文學與華文文學〉，載於楊玉峰主編，《騰飛歲月：1949 年以來的香港文學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學中文學院，2008），頁 1。